

潮流兩岸

近代香港的人和事



潮流 兩岸

近代香港的人和事

周佳榮
◎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序.....	009
--------	-----

第一輯 文化交流和亞洲發展

01	晚清外交官論香港的海防地位.....	012
02	在香港與王韜會面 中日兩國名士的訪港記錄.....	026
03	十九世紀香港書刊在日本的傳播.....	045
04	十九世紀香港與琉球的文化關係.....	056
05	香港新詞對近代中日兩國語文的影響.....	072
06	行道濟世另一章 關景良與香港剪髮不易服會.....	084
07	從辦報到著述 馮自由與辛亥革命.....	106
08	香港網絡與亞洲視角 孫中山思想的當代意義.....	126
09	陶行知與香港 三次訪港留下的影響.....	138
10	陳寅恪的穗港因緣 以陳君葆日記為線索.....	151

第二輯 商會社團與文教活動

- 11 亞洲第一學府
《古樹英華 英華書院校史》外一章…………… 170
- 12 中醫藥在香港早期醫院的應用
以東華三院為研究個案…………… 176
- 13 尋找華商的故事
從《香港中華總商會百年史》說起…………… 188
- 14 香港商會與粵港文化交流
從回顧歷史展望未來…………… 197
- 15 香港商會歷史的地位
兼論九龍總商會的時代角色…………… 205
- 16 嶺南畫派三大家在港澳的活動
以高劍父事跡為主要考察…………… 214
- 17 歷史現場與城市變遷
孫中山在香港活動的史蹟…………… 222
- 18 蔡元培留給香港的記憶…………… 229
- 19 兼容並包和教授治校
蔡元培辦學理念對香港的啟示…………… 235
- 20 許地山論香港史地及教育狀況…………… 240

第三輯 史地研究及文物考察

21	《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獻辭……………	250
22	成長的痕跡——《集體回憶香港地》序言……………	252
23	《建人·建智——香港歷史建築解說》序……………	256
24	我也舊事重提——《香港舊事重提》序……………	259
25	《嶺南之風——美孚荔枝角公園實地考察》序……………	262
26	《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序……………	264
27	《蛻變西貢——尋覓城鄉·文化·承傳》序……………	267

序

近代以來香港發展迅速，商業和金融備受注意，文化和教育卻每每為人所忽略，實則各方面是互有關聯、並駕齊驅的。十九世紀中葉，香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已佔重要席位，是亞洲現代化的先進城市之一，影響且及於中國內地和其他亞洲國家如日本等。香港作為一個海港，在航海事業發達的時代得天獨厚，又是中外文化薈萃之地，孕育了別具特色的文化面貌。本書題為「潮流兩岸」，所述不外乎「近代香港的人和事」，旨在說明香港於亞洲巨變過程中起過的作用，希望藉此填補有關研究的一些不足。

全書共收專題論著和述評、序言等文章二十七篇，分為三輯：第一輯集中於文化交流和亞洲發展，主要是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第二輯圍繞著商會社團與文教活動，多為演講發言及報刊文章；第三輯都是與史地研究及文物考察有關，輯錄了我為七本香港專書撰寫的序言。整體而言，雖則未能包羅香港歷史文化的重要領域，視角卻已溢出地方史的範圍，把香港的人和事置於亞洲研究的廣闊天地。

今日香港是亞洲國際都會，歷來經驗可供其他城市參考之處頗多，把香港置於全中國、全亞洲甚至全球社會發展過程中加以考察，相信是有現實和深層意義的。這些文章能夠結集出版，使更多讀者分享當中的見解，筆者感到十分欣悅鼓舞，願與學界諸君共勉。

周佳榮 謹識

2016年7月2日

第一輯

文化交流和亞洲發展



晚清外交官論香港的海防地位

一、引言

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沿海一帶，自古已是中外交通動脈所在。近代著名史家羅香林（1906—1978年）指出：「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所以被世人重視者，以其為扼海上交通要衝，而有其適宜之地理環境與人文偉跡故也。」^①按香港本島雖發展較遲，但香港所屬之九龍半島與新界地區，自唐宋以來「已為中外交通之要地，就中如新界青山之屯門灣，即為唐宋時代之廣州外港，中外海舶，多經行或下碇其處。蓋以其接連廣州海港，而前有大嶼山為其屏障，宜於避風。香港島則在其東南，亦儼然為海門拱衛。唯外舶入華與粵舶出海，皆須取道於此。」明代時，葡萄牙人東來貿易，猶欲經營屯門作為基地，其後佔據澳門，而屯門附近復常有海盜出沒，至此香港在交通上之重要因素，始為減輕。及至近代，清朝以香港「割讓」於英國，英人「悉力經營，香港本島與九龍半島，日益發展。」^②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與西方國家的交通趨於頻繁，而香港則幾乎是國人從南方往返歐美的必經之地。出外人士當中，以使臣最為重要，他們看到香港這個跟中國各地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城市，轉瞬間呈現了獨特的面貌，感到詫異和新奇，甚至訴諸筆墨。外交人員由於職業關係，一般都有逐日記事的習慣，或方便自己翻查參考，或留待日後向政府報告行程；而鑒於國人出洋的機會不多，普遍缺乏世界知識，這些出使日記也往往印刷成書，以期收到移風易俗之效。外交人員通常會顧及個人身份和國家立場，日記中一般都只作具體的敘述，而較少抒發自己的見解；不過，每當他們接觸到前所未有的事物時，總不免表達一下當時的感想，字裡行間經常流露了過人的卓識。這些議論雖只一鱗半爪，卻是吉光片羽，足為歷史作證，也可供後人參考。

其中頗可注意的一項，是清季外交官員察覺香港地理位置和環境的獨特，認識到香港在海上交通以至海防上的重要性，有時更向朝廷當政者有所建言。本文按照這些人員訪港時間的先後次序，就他們有關香港的言論加以排比，藉此究明香港在近代海防上的地位，希望可以作為近代中國海防思想研究的補充。

二、最早訪港清朝大員的報告書

清政府在 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割讓」香港島予英國。次年，英國委派璞鼎查（港譯砵甸乍；Herny

Pottinger, 1789–1856 年) 為香港總督兼統帥；同年 6 月，清朝的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1790–1858 年）從廣州到香港，與璞鼎查商議關稅問題等項，並舉行條約的換文儀式。耆英因此成為鴉片戰爭後第一個訪港的中國官員，並且向朝廷提交了第一份有關香港情況的實地視察報告書。

早在 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初，欽差大臣、署理兩廣總督琦善（約 1790–1854 年）向朝廷奏請准許英人「仍前來粵通商，並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門寄居之例，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清宣宗——即道光帝愛新覺羅·旻寧（1782–1850 年）對香港毫無所知，曾向軍機大臣等查問：「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迅速查明具奏。」^③ 可是，當時似乎沒有人能夠具體地向皇帝說個明白。

1843 年耆英到香港實地考察後，在他的報告書中說：「香港本屬荒島，重巒複嶺，孤峙海中，距新安縣城一百餘里。從前本係洋盜出沒之所，絕少居民，只有貧窮漁戶數十家，在土名赤柱灣等處畸零散處。」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十分低調的，大概是想避免觸怒皇帝。不過他也交代了英人管治後的成績，同時又說明香港位置的重要性，隱然感覺到這個地方不久將會有更大的發展，請朝廷及早制定對策。他指出英人各項大宗貨物，仍在廣州貿易，「香港四面環海，舟楫處處可通。現在內地民人赴彼零星買賣，數年以後漸集漸多，勢必至華夷雜處，與澳門無異。」^④ 耆英並且認為，香港對內地的影響會甚於澳門。他說：

查澳門地方自前明迄今三百餘年，各該夷先後居住，安分貿易，從未為患，內地亦鮮偷漏稅餉情事。今香港情形幾與相似，若不明定章程，妥為辦理，則走私漏稅，百弊叢生，轉恐與正稅有礙。^⑤

令人不解的是，洋人在澳門「安分貿易，從未為患」，香港既「幾與相似」，何以會「走私漏稅，百弊叢生」？耆英對此並無解釋，恐怕是不想就澳門情況多說題外話，以免橫生枝節，使朝廷懷疑地方官員在管治上的能力。上文提到，耆英謂香港「從前本係洋盜出沒之所」，而不說有本地盜賊活動，理由相信也是如此。但是香港問題既已出現，將來必然多生事端，自亦不能不向朝廷預先陳述，早為之計。

三、1860 年代訪外使團的見聞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飽受內憂外患之苦，內則太平天國佔有半邊江山，外則英法聯軍直搗京師。清朝一些較有識見的官吏，覺察到時勢的需要，於是提出效法西方的主張，以期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持續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展開的。

1866 年（同治五年），清政府派出第一個遠赴「泰西」遊歷的考察團，由斌椿（1804—？年）、斌廣英父子率領三名同文館學

生，親身去接觸西方社會和文化。而組織這次外訪行程的，則是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年）。斌椿在他的《乘槎筆記》中，寫下了他所看到的香港景色：「峰巒重疊如畫圖。入港，數十里樓屋參差，依山傍麓，較上海又別有景象也。」^⑥ 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早把香港與上海相提並論的記錄。

同行的同文館學生德明——即張德彝（1847—1918年），於其《航海述奇》中更仔細地敘述他在船上所見的香港，「群峰壁聳，船舶雲集。迤西一帶，洋樓鱗比。」乘小舟登岸，看到「道途平闊，商戶整齊」，於是感慨地說：「此原係中國海口也，現有英兵持挺，專司行旅一事。」^⑦ 順帶一提，這個歐洲考察團四個月後回國時，再經香港，斌椿和張德彝的著作中都有關於香港夜景的描述。

1867年（同治六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年）離任回國前，清廷竟任命他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於次年率領中國大臣志剛、張家穀出訪美、英、德、俄等國。這個怪誕的「蒲安臣使團」，算是清廷政府向歐美國家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但1870年（同治九年）蒲安臣病死於俄國，由志剛接任使事，其後回程時，曾在香港停泊換船。志剛所撰的《初使泰西記》，內容過於簡略，僅於該年農曆九月十七日條寫了「至香港停泊」五字，^⑧ 無法得知他對香港有何觀感。

同文館學生張德彝，亦是「蒲安臣使團」的隨行人員，不過半途因事提前回國，在1869年（同治八年）下半年經過香港。在他來說，這已經是第三次了，雖然沒有上岸，但還是有所發現。他在

《再述奇》（或作《歐美環遊記》）中寫道：

已初抵香港，進口停舶，見四面樓房以及華洋舟艇，增益於前，堪比金山。^⑨

「金山」即現時習稱的「舊金山」，是指美國三藩市（San Francisco）。張德彝前此初抵金山時，見「左右山多金黃色，土人云，遍山皆黃花也。申正傍岸行三十餘里停泊，兩岸屋宇林立，隱顯於山坳之間。……據土人云，此地在十七年前尚屬曠野，榛莽叢雜，因廣產五金，搜奇者不憚辛苦，咸集於此。刻下土人二十六萬，華人八萬九千，熙熙攘攘，稱名都焉。」^⑩張德彝發覺香港的景觀，在短短兩三年間已有所不同，並且足與美國新興「名都」三藩市相提並論，可見其進步之速。這位年輕的外交隨員，竟可在一百二十多年前洞悉香港和「金山」相若之處，是格外值得我們注意的。

四、1870 年代駐英使團的論點

洋務運動既以模仿西方「船堅炮利」為鵠的，自亦不能不講求中國軍事設施的佈局。1874 年（同治十三年），江蘇巡撫丁日昌（1823—1882 年）在其〈海防條議〉中強調：「中國洋面延袤最寬，目前大小鐵甲船極少」，必須在短期內建造，方敷防守海口。

「至停泊鐵甲船之處，固須水深，然海底必須硬泥之質，庶能受錨，若軟泥質則起錨艱難，沙質則錨易走動，石質及蛤殼質則不能受錨。中國極好錨地，以香港為最，蓋上有重山迴護，可以避風，而下則水深二、三十拓，不致過淺、過深，今已歸之英人，抑無庸議。」又說：「廣東虎門水非不深，而海底不平，且一旦與諸國有事，既不能駛出香港與東北洋諸鐵甲船相聯絡、相應，資首尾之互擊。」^⑪

1876年（光緒二年）郭嵩燾（1818—1891年）任出使英國大臣，由上海南下香港。早在1863年（同治二年）赴廣東巡撫之任時，他已到過香港一次，並在日記中寫道：「由海道進鯉魚門，兩岸皆山，香港最為扼要之地。」^⑫當時所見，香港的房屋僅及1876年的三分之一，「十數年間，街衢縱橫，樓閣相望，遂成西洋一大都會。」^⑬1863年郭嵩燾由香港沿水路赴廣東省時，亦曾注意虎門的重要性，他說：

進平水門後，海面較寬。由零丁洋達虎門，亦極山水雄闊之氣。虎門距香港二百二十里，以大虎山得名，為向日海防重地。……然與洋人相持，固不能據之以為險也。^⑭

1876年以副使身份與郭嵩燾同行的劉錫鴻，在《英軺私記》中亦寫了他對香港的看法。此人以保守聞名，意見常與郭嵩燾相左，但也有可觀之處，例如說香港與新加坡「皆群山環抱一水，船可放碇避風，故洋人利之。港山高峻，入口出口處較狹；坡則岡阜

連延，或起或伏，長八十一里，廣五十二里，不如港之收束，而地勢舒展、物產豐盈則過之……。」¹⁵ 前此使團曾與港督見面，並參觀香港的學館和監獄等設施，留下良好印象，但劉錫鴻對新加坡的評價則不甚佳。這從以下一段文字，可以得到反映：

詢之坡督，類皆茫然。請觀於學館，監獄，則謂監獄整肅不如香港，無可寓目；學館須俟料理，明日乃遊覽也。地處偏僻，不生戒心，亦無屬耳目之眾。故官此土者樂養庸福，諸事輒不經意。雖以英人之喜炫才力，亦不免頹廢焉，豈非勢使之然哉！¹⁶

對香港在海防上的重要性，說得最為透切的，是兩年後——即 1878 年（光緒四年）出使的曾紀澤（1839—1890 年）。他與法國領事同遊香港山頂，憑眺良久，而謂：「香港與九龍司對峙，山勢層疊甚遠，扼全粵之形勝，較大沽海口尤為雄闊，但無淺水處耳。」¹⁷

五、1880 年代外交人員的看法

1881 年，協助李鴻章（1823—1901 年）辦理洋務的馬建忠（1845—1899 年）有南洋之行，同行的吳廣霈（字瀚濤）在其《南行日記》中，對香港的迅速發展，深有所感。他說：

因歎中外未通之日，此港一壞荒島，十丈蠻煙，蠶戶之所經，蛟龍之所窟，蒼涼寂寞，誰與問津。乃異族東來，鑿山通道，遂造屋開市，險者夷之，樸者華之，一轉瞬間，遂成中西第一關津，華夷第一巨埠，斯固亦山靈所不及料。^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論述了香港對於南洋的重要性：

然南洋鎖鑰，片島攸關，我得之可以自固藩籬，彼得之即可以抗我喉嚨。彼萬里叩關，談何容易，既得此島，則南洋之險在彼而不在我，良以當我戶庭，扼我要害，彼可以搯我不出，我不能拒彼不入也。^⑲

香港在海防上的地位，盡見於此數言矣。吳廣霈還描述了港督府的所在，謂港督「宅居崗頂，跨據全山，形勢頗壯，其公廨則在山腰，每數日一至。下有炮台，製甚堅鞏，得地且高，台炮及船，船炮不及台也。」^⑳

1885年（光緒十一年）秋，詩人外交官黃遵憲（1848—1905年）由美國舊金山回國途中，抵達香港，見山河仍舊，風俗依然，慨歎國土淪喪，因而作了以下一首詩：

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
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㉑

「登樓四望真吾土」一句，是從漢末著名文學家王粲（177-217年）〈登樓賦〉中「登茲樓以四望兮」和「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兩句變化而成的；黃龍旗是清朝國旗，「不見黃龍上大旗」此句表達了他對國土淪落外人手中的感慨。

在這之前幾年，即 1879 年（光緒五年），另一位著名詩人康有為（1858-1927 年），在他初次遊覽香港時，看到此地在外國人治下起了巨大變化，卻「傷心信美非吾土，錦帕蠻靴滿目非。」²² 大概黃遵憲剛從異域歸來，對香港頓覺親切，而這又是他第二次到香港，²³ 因而有「真吾土」之感；康有為則從內地來港旅遊，見香港的景觀有異於中國其他地方，所以大興「非吾土」之歎。黃遵憲是外交官，康有為是思想家，究竟香港是「真吾土」抑或是「非吾土」，大概表明了這兩位詩人在心態上的一些不同。

1890 年（光緒十六年）黃遵憲任參贊，隨出使英、法、美、比四國大臣薛福成（1838-1894 年）使歐，攜一子一僕由嘉應州來港登舟，寫了一首〈自香港登舟感懷〉，詩中有「久客暫歸增別苦」、「徙倚闌干獨愴神」等句，²⁴ 道出了使臣飄洋過海的景況。薛福成在南行途中抵香港時說：「香港與九龍山對峙，山勢四面回抱，極佔形勝，英人以為絕好『哈勃』（harbour），涎睨已久。——『哈勃』者，譯言航海避風處也。道光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為英所據，初只一荒島耳，周圍僅數十里；英人招徠墾闢，盡力經營，遂成巨埠。」²⁵ 稍後經新加坡，感歎地說：

余與同人談及，昨所經之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

年前皆荒島也。洋人藉經營商務，闢荒島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於商務最精也。當締造之初，必審其地為水陸要衝，又有泊船避風之澳，有險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於是招致商民，創闢市廛。未幾，而街衢、橋樑、闐闐、園林無不畢具；又未幾，而電線、鐵路、炮台、船塢無不畢具；寢至商稅之旺，民物之殷，輒與中國之上海、漢口相頡頏。²⁶

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個位居南洋要衝的城市，居民都以華人佔多，然而在英人管治下更顯得重要，除了有利的地理環境之外，重視商務發展是主因之一，凡此均使十九世紀末年中國的外交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簡短的結語

十九世紀中國外交人員初出國門，即已體會到香港在海防上的重要性。在 1840 年代，先以香港與澳門相提並論；1860 年代洋務運動開展之初，香港有了一定的發展，外交人員開始認為香港可以媲美上海甚至美國的「金山」（三藩市）；1870 年代中期，更深刻地領略到香港是中國最好的港口之一，其在南洋的重要性與新加坡遙相呼應；直至 1890 年代，認識又再進一步。

扼要地說，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外交人員已能向朝廷充份反映他們的見解，可惜他們在當時雖身居要職，卻未能受到適當的重用。

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在出版後甚至被朝廷下令毀版，便是最明顯的例子。無論如何，在這些外交人員反覆的論述底下，香港的重要性已能逐漸得到普遍的認同，他們的言論至今仍是值得珍惜的。

—— 本文曾在「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1998年6月18日至20日）上宣讀，載李金強、劉義章、麥勁生合編《近代中國海防——軍事與經濟》（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1999年）

註解

- ① 羅香林 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香港前代史，羅香林等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頁1。
- ② 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3-4。羅氏復引港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年）1936年在英國皇家學會發表題為「香港之將來」的演講內容，以支持其論點，其中說「香港在中國地圖上不過是一個小點；然而因為他的海洋貿易，他卻是一個世界上極重要的地方。因為天已賦予香港以無可估價的海港，而且英國人的經略，也已開發了潛伏於此天之厚賦中之勢力；其結果遂使今日香港成為世界最大航業中心之一。」
- ③ 著欽差大臣琦善飭令英人連還定海沙角並查明香港情形事上諭（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天津：天津古

籍出版社，1992年），III，頁50。

- ④ 欽差大臣耆英奏報已與璞鼎查面定通商輪稅章程並換和約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鴉片戰爭檔案史料》，VII，頁192。
- ⑤ 同上註，頁194。
- ⑥ 斌椿《乘槎筆記（外一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6。
- ⑦ 張德彝《航海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9。
- ⑧ 志剛《初使泰西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29。
- ⑨ 張德彝《歐美環遊記〔再述奇〕》（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38。
- ⑩ 同上註，頁45-46。
- ⑪ 丁日昌《海防要覽》（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瀋陽：遼瀋書社聯合出版，1993年影印本），卷上，頁174-177。
- ⑫ 《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二卷，頁130。
- ⑬ 郭嵩燾《使西紀程》，見《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4年），頁31附文。
- ⑭ 《郭嵩燾日記》，第二卷，頁130-131。
- ⑮ 劉錫鴻《英軺私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0。
- ⑯ 同上註，頁31。
- ⑰ 曾紀澤《使西日記（外一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7。
- ⑱ 吳廣霈《南行日記》，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台北：廣文書局，1964年），第十帙，頁2b。
- ⑲ 同上註。
- ⑳ 同上註，頁3a。
- ㉑ 黃遵憲 到香港，載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中，頁401。
- ㉒ 康有為 初遊香港睹歐亞各洲俗，收入《延香老屋詩集》，見《康南海先生詩集》卷之一，收入蔣貴麟主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²⁰（台北：宏業書局，1976年）。
- ㉓ 黃遵憲於1870年（同治九年）赴廣州參加鄉試，歸途經過香港，並寫成《香港感懷十首》，載於《人境廬詩草箋注》，上，頁63-75。

- ②⁴ 黃遵憲 自香港登舟感懷 ，載《人境廬詩草箋注》，下，頁 447。
- ②⁵ 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4。
- ②⁶ 同上註，頁 16。

02

在香港與王韜會面

中日兩國名士的訪港記錄

一、引言

王韜（1828—1897年）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文士和報人，作為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也都有其成就和貢獻。他因上書太平天國而為清政府通緝，於1862年三十五歲時避地香港，自此以至1884年五十七歲返回上海時止，除了1867年至1870年間遠赴歐洲外，在香港居留將近二十載，著述最稱豐碩，是他一生中至為重要、影響力亦最鉅的時期，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論者已予指出：「王韜一生的事業，既能克服傳統與近代的斷層，亦能會通中西文化的隔閡。所以能致此者，實由於香港這個生活環境給他的造就。」^①

王韜居港期間，適值清廷推行洋務運動，中國朝野在經過太平

天國動盪和英法聯軍之役後，飽受內憂外患之苦，一些較有見識的官吏，覺察到時勢的需要，於是提出效法西方的主張，以期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清廷從 1860 年代開始，派遣官員到海外考察，送留學生出洋學習，還委任駐各國的使節，他們在出入國門時多途經香港，由於王韜的卓識已廣為開明、進步的知識人士所推許，不少名人在香港逗留期間都曾訪晤王韜，聽取他對時局的意見。

日本方面，在 1868 年明治維新開展前後，相繼有歐美考察團成行，其中一些訪港人士亦曾與王韜會面。王韜出版了《普法戰紀》一書後，更受到日本軍方、政壇和文化界的注重。1879 年王韜應邀到日本訪問四個月，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樁盛事。^②

有趣的是，中日兩國與王韜接觸過的人物，通常在他們的日記或遊記中都會提及，有的甚至寫得十分詳盡。這些零星的記錄，對於了解王韜居港期間的情況，以及中外有識之士對王韜及其遭遇的觀感，是很有幫助的。可惜有關資料散見於多種著作之中，搜集需時，本文只就筆者所知作初步的整理，相信或可填補王韜研究的若干空隙。

二、王韜流亡香港初期的情形

王韜原名利賓，江蘇長州（今吳縣）人。秀才出身，曾應鄉試不中，1848 年到上海，認識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年），

當時他正主辦墨海書館；次年王韜受雇為中文編輯，一做就是十三年。1861年王韜回鄉探親時，以「黃畹」的假名上書太平天國蘇州當局，建議太平軍力爭長江上游，專注經營天京（南京），緩攻上海。但次年此信為清軍所繳獲，清政府下令緝拿，以「通賊」罪名要求上海租界當局將他引渡治罪。結果王韜在西教士的協助下，從上海逃到香港。^③

據王韜自己所寫的日記，他在1862年10月11日「抵香港，即雇夫攜行李至中環英華書院，見理雅各先生。是夕，與任瑞圖先生同宿。」翌日為禮拜，「詣會堂理君說法，雖操粵語，亦可解。」兩日後在黃勝偕同下，「至英華書院觀活字板，規制略同墨海，惟以銅模澆字，殊捷便。」^④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是英華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校長，任瑞圖擔任他的中文秘書。黃勝總理印書諸務，曾至上海，與王韜相識。至今王韜最為欣喜的，是遇到友人屈煙山，他在日記中寫著：「余來港一人未識，貿貿然至。初入門，即見煙翁，把臂欣然，喜舊識之可恃。蒙其導見，理君特為位置。理君僅解粵音，與余不能通一語，非屈翁幾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⑤ 另有一位任職於西人義塾、俗呼為皇家館的張惠生，也是舊相識。

農曆十月中，王韜在上環散步，途中偶遇包荇洲，「異鄉萬里，得遘故人，把臂欣然，登樓啜茗。」得悉他於二月至港，全家都在此間。王韜又往蘭桂坊訪包榕坊，知他在五月中來港，「自此

時相過從，茗酒流連，談諧間作，異鄉荒寂中不憂無伴矣。」^⑥

十二月初（1963年1月26日），王韜之妻林懷蘅偕二女苕仙、稚仙由上海附貨舶來到香港，王韜自此可以與家眷同住，不必再過孤單的生活。

王韜避居香港後，改王瀚之名為韜，字子潛（紫詮），號仲叟，又號天南邈叟。他協助理雅各整理中國經籍，有一段長時間的合作關係。王韜在〈悔餘隨筆〉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癸亥〔1863年〕春仲卓楚香（湘蘭）來港，住李敬周家。鏡洲招余共談，楚香出詩見示，言能相術，多奇中，謂予四十歲後，功名特達，可冀有為。噫！自經鼠患，無意於浮榮矣。但得飽吃飯，閒讀書，了此餘生，得還故鄉，亦已幸矣。^⑦

按：王韜四十歲，亦即1867年。這年王韜隨理雅各去英國（主要在蘇格蘭）譯書，順便遊歷了法國，曾往巴黎訪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漢學教授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9—1873年）。他在歐洲接觸了許多新鮮事物，眼界為之大開，這對他的思想有一定的啟發。1870年回港後，王韜相繼開展他的出版和辦報事業，言論與著作更為有識者所器重，前述「功名特達」之言似乎不虛，所差的只是沒有受到清廷重用而已。1873年，王韜與黃勝創辦中華印務總局；次年起主編《循環日報》，宣傳變法自強，開近代中國人自辦政論報紙的先河，自此名望更高。

三、李圭和郭嵩燾的訪港記錄

1876年，美國為慶祝建國一百周年，在其獨立紀念地費城（Philadelphia）主辦了一次空前盛大的世界博覽會，李圭（1842—1903年）被推薦以中國代表身份前往參觀，並記錄大會情形。李圭，字小池，江蘇江寧（今南京）人，曾受江寧海關稅務司好博遜（Herbert Edgar Hobson，1844—1922年）之聘，為他管理文牘，在海關供職十餘年，與洋人接觸較多。因此清政府以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年）全權選派代表赴會時，李圭便成為這個所謂「中國代表團」唯一的中國工商業代表。^⑧

李圭環遊地球一周，於回程時經香港。據他所記，農曆十一月二十八日「乘籃輿遊公家花園〔按：即現時動植物公園〕。地方不甚大，亦尚幽靜娛目。午初遇吳中王君紫詮，言談半日，頗能洞悉中外機宜。雖坐而言，要皆可起而行也。不意天南羈旅，世不知其才，良可惜哉！」^⑨ 接著還有以下一段扼要交代香港形勢的文字：

聞此間華人約十三萬，洋人四千。地方繁盛遜於上海，景氣亦不同。蓋上海為平壤，此則環抱皆山也。粵東海口，在其西南，相距二百六十四里，有輪舶日日往來。^⑩

究竟李圭這些資料是與王韜交談時獲悉，抑或是從其他途徑得知，則無從稽考了。

另一個在香港與王韜見面的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外交官郭

嵩燾。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湖南湘陰人。1875年以候補侍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1876年任為出使英國大臣，1878年為出使法國大臣。他表揚西方之長及主張洋務之亟，毫不諱言，因此不斷有人上奏彈劾他，甚至指他出使海外是要中國臣事於英。清廷在言官影響下曾對郭嵩燾加以申飭，並下令把他的《使西紀程》一書毀版。^⑪

1879年郭嵩燾回國時途經香港，次日（即農曆二月三十日）「約伍秩庸、王子潛同至李逸樓處談。並偕子潛至東華醫院，為〔陳〕瑞南諸人所創建者，一依西法為之。收養病者百餘，延醫士八人，兼籌教習醫學。」^⑫接著又記錄了當日的行程如下：

並至西洋學館及博物院一遊。學館總辦史安，同舟至香港，詢知尚未回館。而博物院則兼用粵人劉易之司之，鳥獸蟲魚金石物產之類咸備。所未見者海浮二具，質如菌而形類深紅，容數斗。河豚甲數具，詢之劉易之，曰：「鰈。」蓋左思〈吳都賦〉所謂「鰈鮐」，即河豚也。左為博物院及藏書處，右為戲館，其上樓規模宏闊，尚未能陳設物事。……王子潛見贈《瀛壖雜誌》、《弢園尺牘》，陳瑞南見贈《東華醫院錄》。^⑬

數日後，郭嵩燾在船上閱《瀛壖雜誌》，並回想起多年前在上海見王韜時的情景，^⑭又看了《循環日報》上的一些報導。^⑮郭嵩燾回國後不到北京，稱病退居家鄉。中國首任駐英、法大使竟有如此的遭遇，令人不勝欷歔！

四、馬建忠和吳廣霈的南行日記

1881年，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的馬建忠（1845—1899年）有南洋之行，在香港逗留期間多次與王韜見面，並且同遊公家花園。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1876年郭嵩燾前往英國時，馬建忠以隨員身份去法國中國使館學習洋務。1880年學成回國，後入李鴻章府為幕僚。1881年奉李鴻章命，赴西貢、新加坡、加爾各答等地訪問鴉片輸入情況，並會見印度各地英國總督及地方官員，分析了鴉片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危害，及申述中國嚴禁鴉片入口的理由。^{①⑥}

馬建忠在農曆七月初七日晚上抵香港。「十三日，晴，禮拜日，無事，午後邀王紫詮往遊英國公家花園。石燈迴環，林木清幽，樹杪下視，則海島帆檣，歷歷在目，天然好景，不數圖畫矣。尋夕陽在山，興盡而返。」^{①⑦}其後回國時，於八月二十一日「午前，往謁歐參贊坐談片刻，至循環日報館王紫詮處，有鄭玉軒〔藻如〕星使留寄一函。」^{①⑧}

與馬建忠同行的吳廣霈（字瀚濤），則在其《南行日記》中有極詳細的記載。他在抵香港的次日（即七月初八日）登岸。馬建忠前往拜訪法國駐港領事，吳廣霈則「首先問中環街百步梯所在，急欲與王紫詮兄一晤，東瀛回首別二年矣已。」^{①⑨}以下是他與王韜會面的情形：

乘輿至百步梯，訪至日報館，時當侵晨，紫詮未至，晤其